

孙犁的佚文

萧跃华

姜德明先生珍藏的名家翰墨，我大多有幸饱览，都是令文人墨迹收藏爱好者眼睛发亮的名字——郭沫若、茅盾、巴金、胡愈之、曹清华、夏衍、孙用、赵景深、聂绀弩、张友鸾、冯至、楼适夷、廖沫沙、王冶秋、张允和、艾青、季羨林……

2017年9月14日，姜先生从抽屉拿出一个旧信封，抽出折叠的信纸对我说：“这是孙犁没发表的稿子。”

我脱口而出：“拿到《北京晚报》发表。”

“算了算了。”姜先生摆摆手。

我问“毙稿”原因，甚至连拿过稿子看看的“好奇心”也没有。这大概与我没读过孙犁作品单行本，不了解著名作家佚文的文学史料价值有关。姜先生或许发现了这一点，特赠《耕堂读书记》(大象出版社2008年9月)，扉页题跋：“孙犁的散文百读不厌。跃华同志惠存。姜德明，二〇一七年九月。”并叮嘱：“不要小看这两本小书。”

我不敢怠慢，在回家的地铁上翻起来便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接着读《书衣文录》《芸斋琐谈》《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还不过瘾，又请回《孙犁全集》通读。

这时佚文之事仍然抛之脑后。但读过段华《孙犁年谱》(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知道他发现五十多篇(封)佚文佚信，脑袋一激灵，深感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可我与谭宗远、李俊龙最后一次遇见姜先生是疫情第二年的春节前夕，姜先生已不良于行，想赠送我们什么也无法用言语表达，含糊糊糊用手指着书柜。我们转移了话题，只想给枯坐寂寞的老人一点慰藉。

2022年7月1日，我打电话求助姜先生长子、画家姜旗，并将说过的内容编成微信发过去——

姜旗先生：七八年前令尊从书桌抽屉拿出一封信给我看，里面有孙犁的一封信和一篇未发表过的稿件。我当时说拿到《北京晚报》发表，令尊没有同意。您问问老人家，这封信还放在书桌抽屉吗？如他记不清楚了，您试着翻翻书桌抽屉如何？或许能找到呢！拜托！谢谢！静候佳音！“他已删除了，我找找看吧。”姜旗回复。

六天后，姜旗发微信给我：“抽屉翻过了，没找到，我再试试。”

我穷追不舍：“孙犁信稿旁再找找，不是抽屉就是书桌柜里，消失了太可惜啦。”

姜旗终于没找到。我老惦记着，与谢大光、刘运峰、侯军、段华闲聊时还说起这件事情，他们都感到惋惜。

受疫情影响，姜旗已经两年多没回美国与家人团聚。他看到住院回家的父亲身体滑坡势头有所减缓，征得父亲同意前往美国探亲，可走没几天就传来噩耗。当时机票十分紧张，他花天价从美国绕道台湾返京。我带着花篮前往“无名书斋”凭吊时，姜旗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我们聊到姜先生藏书处理问题。姜旗说：“老萧，你放心，孙犁那封信我一定帮你留意。”

北京东郊宾馆送别姜先生第二天，姜旗发来微信：“老萧，孙犁稿子找到了，改天我复印给你，这几天又忙于6月9日去天津墓地合葬我父母的骨灰，别急，我会给你。”

“不急不急，先忙大事。您回来后我去趟府上，一起到打字店扫描一下就行。”我想写篇文章纪念佚文的发现过程。

6月21日，姜旗发来微信：“老萧，请把地址发给我，孙犁的佚文我快递给你。”我立马打电话过去，问姜先生藏书整理进度如何。他说：“我们三个人(他和妹妹姜尤、姜莹)正在逐一录入电脑，分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后二七年、1976年后三个阶段，海王村拍卖会来找过我们。”

“顺丰同城急送”是端午那天投递到单位传达室的，翌日正好值班，我迫不及待打开，发现是姜先生撰写的《孙犁的佚文》未定稿。我心有不平，反复提醒姜旗注意，同时跟北大文科毕业的姜莹打招呼，请她也留意留意。可小半年过去了，佚文仍杳如黄鹤。我无数次想亲自登门翻检，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中国嘉德2023秋季拍卖会，姜先生五十余件

藏品列入《相忆集——八家重要私人珍藏集珍》。姜旗友情提示：“预展人不少，可以去看看。”11月27日中午，我步行至王府井大街1号，看完预展又想起佚文，拿起手机给姜旗打电话，告诉孙犁佚文写于哪年哪月，就翻这个时段的孙犁来信，拜托帮忙再找找，未了还是将说过的内容编成微信发过去——

姜旗先生：中午去嘉德看预展了，好东西不少，可惜囊中羞涩。今尊说到孙犁的“佚文”落款时间是“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孙犁书札——致姜德明》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又说“那篇题跋，原系寄你存念”。可空闲时翻翻，看能不能找出《题姜德明同志所藏孔德学校国文讲义残卷》原文？

姜旗回复：“试试看吧，祝你工作顺利！”

我耐心地等待着。

12月4日，我刚到办公室就收到姜旗微信：“是这个吗？费老劲了，才找到。”接着发来三张图片(右图)，孙犁这篇佚文终于浮出水面。

题姜德明同志所藏孔德学校国文讲义残卷

孙犁

民族文化之发展，固如万物之生生不息，江河冲击而前。然统观历史演变，文化之发明与发展，实非易事也。破坏之机遇，保护之危机。人民文化落后，教育不普及，道德观念薄，皆不利于文化之发展。历代鼎革，受害尤烈。文物精英，荟萃京城，兵灾战祸，首当其冲。农民革命，虽有助于文化之改进，然当时领袖，多用愚民政策，驱使群众，于摧毁旧政权之同时，亦毁灭与之并存之文化。新朝建立之后，文化衰落凋残，不利于政治，乃不得不从一、二遭老，传受文化遗产，破壁毁塚，以求书籍文物。轮回往复，历代如斯。及至晚清，锁国政策破灭，即敦煌石室埋藏数代之物，国家亦不知爱护保存，遂为外人攫取而去。国人查阅资料，只好屈身到外国借阅。吁，亦可悲矣！

文化之遭遇，亦如万物之有春冬乎？雨露少而霜雪重乎？爱之者稀而忘之者众乎？建设难而破坏易，难怪其进展之缓缓也。当破坏时，烧一书如村妇嫁火，碎一瓶如小儿掷炮，甚至毁一建筑，死一学者，轻而易举，聚众围观，视为快意。而后患无穷，觉悟其愚果，而思拯救之，则常常为时已晚，不易收拾。文化与社会道德紧密相连也。

姜德明同志，于十年浩劫之后，文化灰烬未除之际，如此珍重残篇剩简，其意至善至美。启发国人，对文化遗产，皆知爱护保存，勿轻弃之，勿残害之，则当前舆论之重任也。

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

附记：德明同志以书册命题，初为此文。后见前列诸公文意，乃知主题并非在此，遂另录他文以应，此作遂废。

姜旗说：“没有信封，没有书信，就三页稿纸。”可我明明看到姜先生从信封中拿出来的呀，大概率整理过程中弄散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姜先生从旧书店拣得二十年代北平孔德学校的一本国文讲义，比较完整的是叶圣陶的四篇作品。他突然奇想：“以为就此装成小册，留有若干素页，请师友说上几句话，当是有关叶老的一本纪念册。”于是，姜先生先后请俞平伯、钱锺书、郑逸梅、冰心、钟敬文、臧克家、柯灵、唐弢、吴祖光、端木蕻良、黄裳、周汝昌、杨宪益、辛笛等(孙犁题跋所说“前列诸公”)赐墨，素纸写满了完美收官。

孔德学校(今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成立于1917年，由蔡元培(字子民)、李石曾、沈尹默、钱玄同等创办，校长蔡元培，中法庚款提供经费支持。校址初设东城区方中巷华法教育会，后迁入东华门大街宗人府。校名是纪念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师生与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

《知堂回想录》(岳麓书社2020年10月，周作人著，钱叔河编订)之《一五三 坚冰至》回忆与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字守常)交往：“那时的孔德学校，是蔡子民及北大同人所创办，教法比较新颖，北大同事的子弟多在这里读书，守常的一个儿

子和一个女儿，也都在内。那时我担任孔德高中的一年国文，守常的儿子就在我班里，最初有时候还问他父亲安好，后来未了这几个月，连他儿子也多告假不来，其时已经很危险了。”这里说到李大钊被捕前的处境已相当不妙了。孔德学校教师大部分来自北大，北大子弟陈香梅、钱三强、吴祖光等就毕业于这所学校，时谓北大文学院附属中学可谓实至名归。

其《一六三 北大感旧录(九)》回忆与马隅卿交往：“我与隅卿相识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但直到十四年我担任了孔德学校中学部的两班功课，我们才时常相见。当时系与玄同、尹默包办国文功课，我任作文、读书，曾经给学生讲过一部《孟子》《颜氏家训》和几卷《东坡尺牍》。隅卿则是总务长的地位，整天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又正在替孔德图书馆买书，周围堆满了旧书头本，常在和书贾交涉谈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没在这所学校任过课，却到孔德学校图书馆查书、借书。

我电话咨询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校务处负责人，他们居然不知道叶圣陶曾在这里教过书。我只好跑首都图书馆借阅商金林撰著《叶圣陶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求证，找到1922年2月22日两段文字：

同日 离沪北上，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中文系主任马裕藻的聘请，任北大预科讲师，主讲作文课。同车有郑振铎和俄国盲诗人、著名童话作家和世界语学者爱罗先师。

叶圣陶《题〈角直闲吟图〉》：“寓所在大石作，同舍皆苏州人。吴缙照兄携卷，照料诸人餐事。顾刚兄、潘介泉兄皆独居一室。余与伯祥共一室。夜同睡砖炕。……然余留京仅月余而请假南归，所任作文课伯祥概充为代。南归之故为墨林将分娩，余须伴之到苏州就产医生。四月下旬生至美。”

伯祥即王伯祥，“姑苏五老”之一。

叶圣陶就是这个时候到孔德学校兼课的。孙犁“另录他文”即：

我第一次读到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是一本灰色封面，题名《隔膜》的短篇小说集。这是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丛书之一，一九二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叶绍钧(圣陶)。这一本书，使我知道了中国新的短篇小说的样式。蒙德明同志不弃，以此册见示，仅录近作文字一节应命。

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大风寒过后 孙犁

十一天后，孙犁致信姜先生——

德明同志：

三月十一日函敬悉。

那篇题跋，原系寄你存念。不便发表，因又系文言文，恐引起议论。

巴金同志的建议，当然我是非常赞同的。专此，祝

好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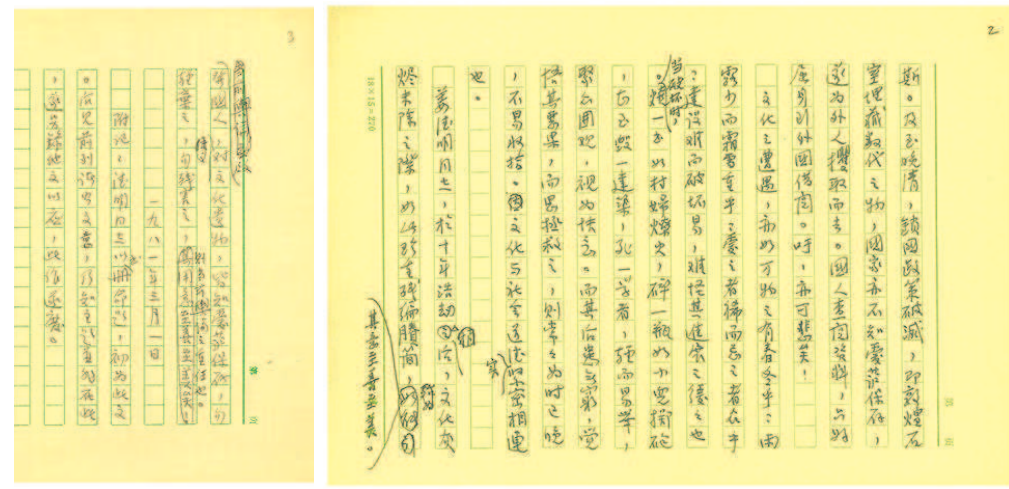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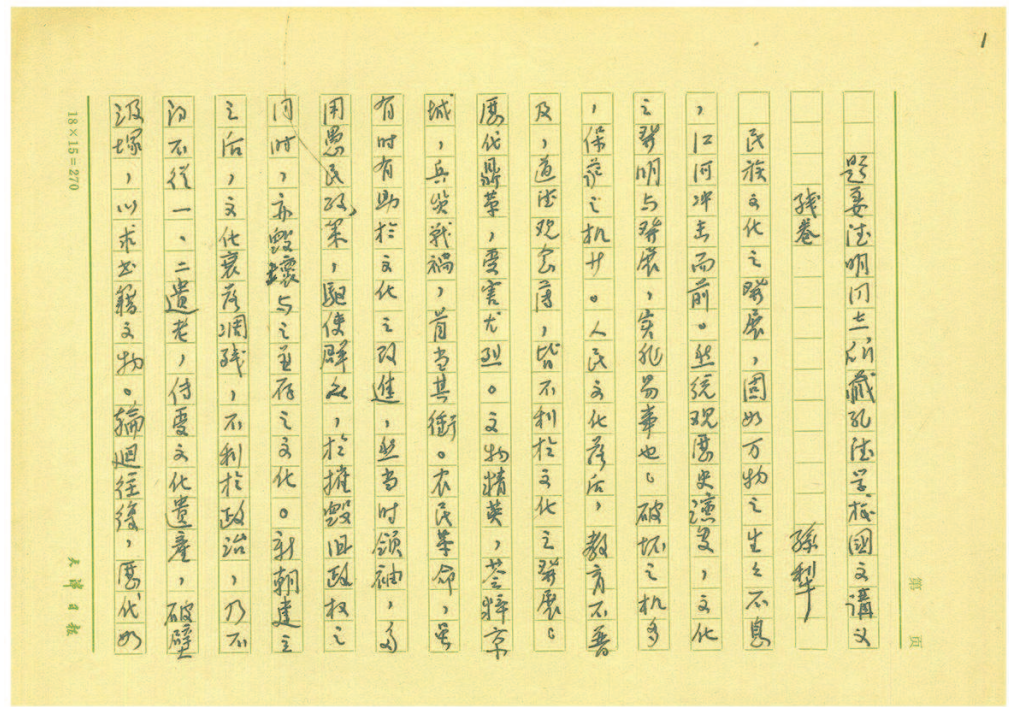
“不便发表”大概是姜先生收到题跋后回信所说，孙犁推测“因又系文言文，恐引起议论”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姜先生时任人民日报社文化部副刊组组长，在自己分管的一亩三分地刊发“表扬”自己的文字，且大名还上标题，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姜先生谦恭谨慎，从不以稿谋私，于是文稿尘封了三十六年。他晚年清理师友旧信，忽然发现这篇佚文，由此感叹“光靠记忆来回想往事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此事早已忘得精光”。睹物思人，姜先生从“此作遂废”中读出：“作者关怀文化建设之情跃然纸上，虽写小品，亦怀深意，此正孙犁为文的风格也。”

“巴金建议”，即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

我“打捞”孙犁佚文的这一年半时间里，不知给七十五六岁的姜旗打过多少电话、发过多少微信，他翻箱倒柜找佚文，为《孙犁全集》增补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谢谢姜旗老兄！

癸卯大雪



【补记】

“文汇报”微信公众号2月21日推送拙稿《孙犁的佚文》后，编辑部转来读者来信，指出“佚文”已于1981年6月7日《文汇报·笔会》刊出。我感到无地自容，就像采访不深入，写了篇报道被读者检举揭发是假新闻一样。这则题跋孙犁为什么改投《笔会》？他究竟没跟姜先生知会一声？我查阅先生编著《孙犁书札——致姜德明》(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从第12页找到了答案——

德明同志：

11/6惠函敬悉。刊物收到。六月七日文汇报登了那个题跋。原是他们约稿，我手头只有此稿，寄去，他们就登出了。标题及结尾，他们作了一点改动。请查阅该日报纸，此事我本应事先告诉你的。

入夏以来，大杂院的特色就都暴露出来，不能好好睡眠，写东西也就少了。如有合适稿件，一定寄呈。祝

好

犁14/6

甲辰正月十九

编辑手记

高山景行 学海无涯

接连收到微信留言和邮件，说“孙犁佚文”就发表在笔会，我们除了惊讶读者中有不少“扫地僧”，也感慨于前辈编辑留下的文脉资源实在深厚，是富矿，也像无涯学海，值得不断学习、探索。

当时的报纸，没有责任编辑的署名，就和几位前辈报人打听了一下。朱大路老师的回复又快又清晰：

1984年9月进《笔会》，2007年4月退休，做《笔会》编辑近23年。

朱老师的严谨、负责，有同事记忆犹新。在此再次感谢不吝赐教的读者朋友，也感谢萧跃华先生的执著、大方、实事求是。

孙愚、张晓明、施国英等，其中有的同志也以文艺部负责人的身份兼管《笔会》。1981年6月7日刊登的孙犁这篇文章，究竟由谁约稿，由谁担任编辑，估计很难查到了，因为其中有的已离世，有的已调离，有的已出国定居……人世沧桑，变化很大。

今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60周年。由于第一手资料的严重缺乏，莎士比亚对世人来说始终是个谜。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争议最大的作家，他是否存在？那些作品是不是他写的？质疑之声从来没有消停过。那么关于莎士比亚生平种种信息最初究竟从何而来？我们的教科书、著作、文章中论及的莎士比亚依据的到底是什么？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问题，都是人云亦云。

关于莎士比亚，见之于文本的最初应该是1623年第一对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收录了莎翁的36部剧本，不包括现今所说的《泰尔亲王佩力克里斯》，后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皆以此为蓝本。开篇是后起之秀，莎士比亚在剧坛的竞争对手本·琼生的献词，琼生不吝赞美之词，以激情洋溢的诗句巧妙地提到了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活的场所、生活的时代、受教育的程度、受君主的赞赏、同时代的戏剧家、崇高的戏剧地位。本·琼生称莎翁为时代的灵魂，戏剧元勋，诗界泰斗，把他比喻为埃文河上的天鹅，飞临泰晤士河(即指伦敦生活)，这一描述有力地反驳了斯特拉福镇的莎士比亚不是伦敦的



关于莎士比亚的最初信息从何而来

张薇

莎士比亚的说法。琼生认为莎翁不大懂拉丁文，更不通希腊文，但他的才华盖过了“黎里、淘气的基德、马洛的雄壮的笔力”，“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李之味译)。不过这只是诗中粗略提及，生平并不具体。1641年琼生又在《素秀才干：对人及生活方式的发现》(简称《发现录》)中评价莎士比亚，赞美他诚实，本性开放而自由，具有杰出的想象力。独到的见解和优雅的表达，在诸多方面他都娴熟如流并且滔滔不绝。

真正具体谈及莎士比亚生平的是1709年英国剧作家尼古拉斯·罗在雅各布·汤森编撰的六卷本《莎士比亚作品集》中写作的序文《作者生平》，首次试探着写了莎士比亚的人生故事，拿出了一份40页的背景概述，八千字中大约有一千字具体介绍了莎士比亚的生平。根据罗的记录，威廉·莎士比亚是约翰·莎士比亚的十个孩子中的大儿子，1564年4月出生在埃文河上的斯特拉福镇，他在学校学了一点拉丁文，后来辍学。他与殷实的自耕农的女儿安妮·哈瑟薇结婚。他曾到莱克特村偷猎了路西爵士庄园里的鹿，被诉讼，因为莎士比亚觉得爵士滥用权力，于是写了打油诗加以讽刺，更激怒了路西爵

士，诉讼更加激烈，莎士比亚不得不离开家乡前往伦敦避难。在伦敦他写作、演戏、扮演过《哈姆雷特》中的鬼魂。莎士比亚结识扫普敦伯爵和埃塞克斯伯爵，友情深厚。《亨利五世》第五幕开幕的致辞人的台词就是献给埃塞克斯伯爵的。罗说莎翁学了一点法语，在《亨利五世》中有表现。莎士比亚后来退隐到故乡，会会朋友，53岁去世，安葬在斯特拉福镇的大教堂的高坛的北边，去世前自己写了碑文，告诫世人不要挖他的墓。大女儿苏珊娜嫁给了有名望的霍尔医生，他们生下了唯一的女儿，这个女儿先嫁给了纳什，后来嫁给了约翰·伯纳德。但罗在叙述中也有臆测附会的嫌疑，甚至有错误。他把莎士比亚的女儿说成了三个，其实是两个，罗把《亨利八世》最后一幕对伊丽莎白一世的赞词说成是《亨利七世》的，并认为莎士比亚只写过一首长诗《维纳斯和阿都尼斯》。

尽管尼古拉斯·罗的记录不太准确，但他至少勾勒了莎士比亚生平的主干。后世以此为依据，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考证，不断地添枝加叶，于是逐渐形塑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莎士比亚形象。后世一些著名的莎士比亚传记如哈利威尔·菲利普的《莎士比亚生活轮廓》、西德尼·

李的《威廉·莎士比亚的生活》、埃德蒙·钱伯斯的《威廉·莎士比亚：事实与问题研究》、塞缪尔·舍恩鲍曼的《莎士比亚：生活实录》、安东尼·伯吉斯的《莎士比亚》、彼得·阿克罗伊德的《莎士比亚传》、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斯坦利·威尔斯的《莎士比亚戏剧生活》、查尔斯·威廉斯的《莎士比亚小传》、比尔·布莱森森的《莎士比亚：世界像一个舞台》等等无不参照这一原初的记录。研究莎士比亚生平的学者曾说，每一部莎士比亚传记都是5%的事实加上95%的猜想，有些传记家甚至喜欢把猜想说成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看来从虚拟语气转向陈述语气的冲动总是强烈的。

除此之外，斯特拉福镇圣三一教堂里莎士比亚的出生洗礼、结婚、安葬记录和墓碑，他的六个不同的签名(来自自遣嘲、婚约等)，也是最初信息的有力证据。六个签名分别是“Willm Shakspe”“William Shakespe”“Wm Shakspe”“William Shakspeare”“Willm Shakspeare”和“William Shakspeare”。有趣的是：现在通行的威廉·莎士比亚的拼写(William Shakespeare)他从来没用过。当然，现在的拼法应该是从第一对开本上来的。

关于莎翁著作权，罗在《作者生平》中提到了33部，不包括《李尔王》《辛白林》《维洛那二绅士》《一报还一报》。因为缺乏莎士比亚的手稿，后世对其著作权争论不休，要不是有一本内容翔实的《智者宝典》的存在，人们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该书出版于1598年(莎翁在世)，作者是弗朗西斯·梅雷特，它厚达700页，他确证莎士比亚创作了喜剧《维洛那二绅士》《错误的喜剧》《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写作了悲剧《理查二世》《理查三世》《亨利四世》《约翰王》《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就是说，截止到1598年，莎士比亚已经写出了这些作品，这一事实有力地推翻了那些“倒莎派”的观点，即否认这些作品是莎士比亚所写。

关于莎士比亚的原始资料实在太缺乏了，如果能找到任何一点实物，那都是天大的发现。安东尼·伯吉斯曾说了一句妙言：“倘若在发现莎士比亚的一部新剧和发现他的一张洗衣单之间可以任选其一，我们每次都会投票选他的脏衣服。”足见人们是多么迫切渴望得到莎士比亚的原始资料，以及，第一对开本、本·琼生和罗所提供的最初信息是多么珍贵。